

## 南北朝經學盛衰評議

黃忠天

### 摘要

對於魏晉南北朝經學的定位，前賢或將魏晉南北朝均視為經學中衰；或以中衰視魏晉，以分立視南北朝；或以南學盛而北學衰；或以北學盛而南學衰，所論殊不一致。本文以南北經學盛衰評議為題，即欲藉鳩合舊籍，借助史料，重新省視前賢評論南北經學「盛衰」的妥切性，並藉由多元角度，瞭解諸家對南北朝經學理解差異的所在，分別從在位態度、時局世變、經學教育、經學純駁、經學著作等五方面之比較，提出個人管窺之見，以探其原委，希望對於廓清南北朝經學面貌，能收潦盡潭清之功。

關鍵詞：南學 北學 經學史 南北朝經學

---

\* 黃忠天現職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教授。

## **Review on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Huang Chung-tien

### **Abstract**

When it comes to the positioning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Wei, Ch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viewpoints on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Wei, Ch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re quite different. Some predecessors regard Wei, Ch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ll as the decline of Confucian classics, some regard the Wei and Chin Dynasties as the decline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separate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from this topic, some regard Southern Dynasty as the prosperity of Confucian classics while regard the Northern Dynasty as the decline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still come regard Northern Dynasty as the prosperity of Confucian classics while regard Southern Dynasty as the decline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examin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predecessors' viewpoints on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rough assembling information in ancient book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addition, it aim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from various schools through diversified viewpoints. It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of various schools through five aspects, which were the attitudes of rulers, changes of time and situations, educ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discussions o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writings of Confucian classics, respectively. It is hoped that the findings may help clarifying the features of Confucian classic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Keywords: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Northern Dynasty,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Confucian classics

---

\* Professor,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 一、前言

中國幅員遼闊，南北自然環境、風土人情、氣質偏重殊異，表現於思想文化種種層面上，亦各具風貌。尤其在五胡亂華之後，南北由於政治的對峙，江南江北形同隔絕封閉的態勢，經濟與文化往來受阻，學術風氣更呈現明顯的地域特色，經學遂有所謂北學南學之稱。

近 30 年來，專就南北朝時期經學史探討的專著約有五種，如汪惠敏《南北朝經學初探》<sup>1</sup>、簡博賢《今存南北朝經學遺籍攷》<sup>2</sup>、章權才《魏晉南北朝隋唐經學史》<sup>3</sup>、田漢雲《六朝經學與玄學》<sup>4</sup>、焦桂美《南北朝經學史》<sup>5</sup>等等。其中簡氏之作主要討論南北朝經學著作的存佚；田氏一書雖似考察六朝時期的經學與玄學的關係，然其書將經學與玄學分開討論，對於兩者之間的關係及其影響，著墨不多，且單就六朝部分論述，北朝經學遂略而弗論。焦桂美博士論文關注層面甚廣，能從宏觀角度析論南北朝經學師承、家學、經學家的遷徙、經學與其他學科（文學、佛教、史學、文論）之間交互影響等等，並分別就南朝經學與北朝經學的情形論述，並以探討南北經學的異同及其對唐代經學的影響作結。其書整體結構與論述，堪稱近年來研究南北朝經學史的佳作。惜其參考資料雖豐，然對臺灣地區研究成果，僅參考簡博賢諸作，其他如黃慶萱《魏晉南北朝易學書考佚》<sup>6</sup>、沈秋雄《三國兩晉南北朝春秋左傳學書考佚》<sup>7</sup>、柯金虎《魏晉南北朝禮學書考佚》<sup>8</sup>、高荻華《皇侃論語集解義疏研究》<sup>9</sup>等等，作者均未及參考，誠為美中不足。近幾年來，兩岸地區亦有一些關於南北朝經學主題式的研究，如橋本秀美《南北朝至初唐義疏學研究》，該論文討論現存南北朝至初唐義疏作品，不臧否諸家學說，作者自言「本論文并非經學家之經學史，

<sup>1</sup> 汪惠敏：《南北朝經學初探》（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6年）。後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於1979年出版成專書。

<sup>2</sup> 簡博賢：《今存南北朝經學遺籍考》（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5年）。

<sup>3</sup> 章權才：《魏晉南北朝隋唐經學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

<sup>4</sup> 田漢雲：《六朝經學與玄學》（南京：南京出版社，2003年）。

<sup>5</sup> 焦桂美：《南北朝經學史》（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

<sup>6</sup> 黃慶萱：《魏晉南北朝易學書考佚》（臺北：幼獅文化事業，1975年）又：（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重印。

<sup>7</sup> 沈秋雄：《三國兩晉南北朝春秋左傳學書考佚》（臺北：國立編譯館，2000年）。

<sup>8</sup> 柯金虎：《魏晉南北朝禮學書考佚》（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4年）。

<sup>9</sup> 高荻華：《論語集解義疏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而是讀書者之經學史論故也」<sup>10</sup>。或如張煥君《魏晉南北朝喪服制度研究》<sup>11</sup>，主要探討「喪服」制度的演變。或以專經經學史之探究，如張勇《南北朝《周易》學》。<sup>12</sup>另有書題雖無經學二字，然其內容仍涉及當代經學史之探討者，如林登順《魏晉南北朝儒學流變之省察》<sup>13</sup>，劉光育《南北朝儒學研究》<sup>14</sup>等。林登順該書從儒學與教育的關係立論，並在〈經學與經籍詮說之風貌〉一文中，論及三國、兩晉、南朝、北朝的經學內涵，及儒學與諸學之交涉，其處理的概念早於焦桂美博論的架構，通觀其書論述儒學的流變，實與經學史問題息息相關。

另外，在專家經學的研究上有陳金木《皇侃之經學》<sup>15</sup>、《劉焯劉炫之經學》<sup>16</sup>，高荻華《論語集解義疏研究》<sup>17</sup>，顧濤《皇侃論語義疏研究》<sup>18</sup>、劉詠梅《皇侃《論語義疏》研究》<sup>19</sup>等。而單篇論文部分有陳鴻森〈北朝經學的二三問題〉<sup>20</sup>、陳鴻森〈魏晉南北朝經學史小識〉<sup>21</sup>、黃忠天〈南北朝經學之消長與統一〉<sup>22</sup>、李威熊〈北朝經學與胡人漢化〉<sup>23</sup>、〔日〕室谷邦行著；陳靜慧譯〈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六朝疏學的展開〉<sup>24</sup>、戴榮冠〈論南朝儒經義疏的形成——以儒釋兩家為

<sup>10</sup> 〔日〕橋本秀美著：《南北朝至初唐義疏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學位論文，1999年）。後日本有〔日〕喬秀岩：《義疏學衰亡史論》（東京：白峰社，2001年）。按：喬秀岩即橋本秀美，是書似為博士論文之修訂版。

<sup>11</sup> 張煥君：《魏晉南北朝喪服制度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專門史專業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

<sup>12</sup> 張勇：《南北朝《周易》學》（西安：西北大學專門史（中國思想史）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

<sup>13</sup> 林登順：《魏晉南北朝儒學流變之省察》（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

<sup>14</sup> 劉光育：《南北朝儒學研究》（南京：南京大學中國哲學專業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

<sup>15</sup> 陳金木：《皇侃之經學》（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年）。

<sup>16</sup> 陳金木：《劉焯劉炫之經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1989年）。

<sup>17</sup> 高荻華：《論語集解義疏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0年）。後由花木蘭出版成書（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

<sup>18</sup> 顧濤：《皇侃《論語義疏》研究》（南京：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

<sup>19</sup> 劉詠梅：《皇侃《論語義疏》研究》（曲阜：曲阜師範大學歷史學專門史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

<sup>20</sup> 陳鴻森：〈北朝經學的二三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6本第4分（1995年12月），頁1075-1101。

<sup>21</sup> 陳鴻森：〈魏晉南北朝經學史小識〉，《東海學報》第35卷(1)文學院（1994年7月），頁1-20。

<sup>22</sup> 黃忠天：〈南北朝經學之消長與統一〉，《孔孟月刊》第30卷第8期（1992年4月），頁20-28。

<sup>23</sup> 李威熊：〈北朝經學與胡人漢化〉，《孔孟月刊》第17卷第2期（1978年10月），頁36-39。

<sup>24</sup> 〔日〕室谷邦行著；陳靜慧譯：〈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六朝疏學的展開〉，《經學研究論叢》第十輯，2002年，頁105-122。

研究對象》<sup>25</sup>、戴榮冠〈南北經學交流與南朝義疏發展之探究〉<sup>26</sup>、黃麗娟〈魏晉南北朝經學中衰原因探析〉<sup>27</sup>等文，對於南北朝經學均各有卓見。

關於研究的範疇，若從政治因素所造成南北對峙分立後的南方經學言，自宜包括東晉及南朝四代經學，不過南朝四代經學猶承東晉餘響，因此，本文所論「南學」，主要從宋齊梁陳四代來研究。至於北學，本宜自晉室東渡後，南北二地隔絕為始，迄隋文帝開皇統一天下止。其間包括五胡十六國、北魏、西魏、東魏、北齊、北周諸朝。唯本文為便於南北經學盛衰消長的考查，在「北學」的界定上，蓋以北魏、西魏、東魏、北齊、北周諸朝合論之。

對於魏晉南北朝經學的定位，前賢所論似不一致，或將魏晉南北朝均視為經學中衰，如黃麗娟〈魏晉南北朝經學中衰原因探析〉；或以中衰視魏晉，以分立視南北朝，如皮錫瑞《經學歷史》<sup>28</sup>；或以南學盛而北學衰，如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sup>29</sup>；或以北學盛而南學衰，如〔日〕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sup>30</sup>、李威熊《中國經學發展史論（上）》<sup>31</sup>、葉國良、夏長樸、李隆獻《經學通論》<sup>32</sup>等等，本文以南北經學盛衰評議為題，即欲藉鳩合舊籍，借助史料，重新省視前賢在論述此一時期經學，習以「盛衰」一辭，較南北經學短長的妥切性，並藉由多元角度，瞭解諸家對南北朝經學理解差異的所在，本文擬從五方面提出個人管窺之見，以探其原委，希望對於廓清南北朝經學面貌，略能收潦盡潭清之功。

<sup>25</sup> 戴榮冠：〈論南朝儒經義疏的形成——以儒釋兩家為研究對象〉，《雲漢學刊》12（2005年7月），頁71-85。

<sup>26</sup> 戴榮冠：〈南北經學交流與南朝義疏發展之探究〉，《高師大國文學報》2（2005年6月），頁223-248。

<sup>27</sup> 黃麗娟：〈魏晉南北朝經學中衰原因探析〉，《思辨集》第3集（1999年3月），頁75-92。

<sup>28</sup> 如皮錫瑞《經學歷史》第五章以魏晉為經學中衰時代，第六章以南北朝為經學分立時代，唯於該章中皮氏又謂「北學反勝於南者，由於北人俗尚樸純，未染清言之風……」，是又以北學為盛矣。（臺北：漢京文化，1983年），頁182。

<sup>29</sup> 如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南北學派不同論·南北經學不同論》云：「及貞觀定五經義疏，南學盛行而北學遂湮沒不彰矣」（臺北：京華書局，1970年），頁660。

<sup>30</sup> 如〔日〕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云：「以南北二朝底經學比較起來，南朝似不及北朝。這因為南朝政府當局不重視，故修之者少」（臺北：廣文書局，2001年），頁209。

<sup>31</sup> 如李威熊云：「南朝經學雖衰，但仍頗有可觀」，又云：「北朝文教風氣之盛，甚至於超過南朝」。《中國經學發展史論（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頁226與234。

<sup>32</sup> 如葉國良等云：「與南方相較，北方的政權都由少數民族建立，政府的領導者多半有心接受漢人的文化，因此北方的君主極力推動儒家教育和儒家經典的研究。如此一來，北方的經學就比南方興盛，經師也多於南方，形成南北不同的學風，這就是經學分立時代。」《經學通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年），頁508。

## 二、從在位者態度看南北經學盛衰

### (一) 南朝方面

南朝宋、齊、梁、陳歷代君主，真正重視經學而獲致成效者，唯梁武帝一人而已。自三國魏正始以來，人尚清談，玄風日盛，唯歷永嘉之亂與五胡亂華慘痛教訓，雖玄風稍抑，然政權更替，學校教育制度破壞，在位者亦未見積極作為。據《南史·儒林傳序》云：

自中原橫潰，衣冠道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眾，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鬱也久矣乎！至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sup>33</sup>

由上述之文觀之，南朝在位者僅梁武帝重視經學，其餘在位者似均不甚措意學術，惟細究史書所載，或未必盡然。如宋武帝劉裕於即位後第3年（422年），即下詔立國子學，據《宋書》云：

古之建國，教學為先，弘風訓世，莫尚於此，發蒙啟滯，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學藝，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馬在郊，旂旗卷舒，日不暇給。遂令學校荒廢，講誦蔑聞，軍旅日陳，俎豆藏器，訓誘之風，將墜于地。後生大懼於牆面，故老竊歎於子衿。此國風所以永思，小雅所以懷古。今王略遠屆，華域載清，仰風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獎童蒙，選備儒官，弘振國學。主者考詳舊典，以時施行。<sup>34</sup>

從劉裕所下詔令，足見其重視經學，且亟欲恢復國子學的企圖，也代表經學對於南朝君主而言，仍是選才的依據。然而武帝於同年5月去世，使政策無法實施，直到宋文帝即位後19年（元嘉19年，442年），才建立國子學。復於元嘉27年（450年）又因宋魏的戰爭，不僅減百官俸祿，更廢國子學！<sup>35</sup>

<sup>33</sup> 《南史·儒林傳》卷71（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頁1730。本文所引據史書，皆以楊家駱主編之新校本二十四史為主，由臺北鼎文書局出版，下引時不再註明出版項，選標卷數及頁數，書此說明。

<sup>34</sup> 《宋書·武帝本紀》卷3，頁58。

<sup>35</sup> 《宋書·文帝本紀》卷5：「以軍興減百官俸三分之一。三月乙丑，淮南太守諸葛闡求減俸



再如《南齊書·高帝本紀》亦載蕭道成曾於元嘉 16 年（439 年）入雞籠山從雷次宗受學《禮》與《左氏春秋》<sup>36</sup>，又《南史·劉瓛傳》云：

齊高帝踐阼，召瓛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sup>37</sup>

又《南齊書·高帝本紀》亦云：

四年春正月壬戌，詔曰：「夫膠庠之典，彝倫攸先，以招振才端，啟發性緒，弘字黎氓，納之軌義，是故五禮之迹可傳，六樂之容不泯。朕自膺曆受圖，志闡經訓，且有司羣僚，奏議咸集，以戎車時警，文教未宣，思樂泮宮，永言多慨，今闕燧無虞，時和歲稔，遠邇同風，華夷慕義，便可式遵前准，脩建敦學，精選儒宮，廣延國胄。」<sup>38</sup>

由上述可見蕭道成非不重經學，惟宋魏以來連年征戰，致文教未宣，偶邊境無事，又思及脩建學校，惟是年（482 年）蕭道成崩殂，至齊武帝永明 3 年（485 年）始詔立太學。

南齊中興 2 年（502 年），齊和帝被迫「禪位」於蕭衍，蕭梁於焉建立。蕭衍即位第 4 年（天監 4 年，505 年）便詔立國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其積極重視儒學如此，在南朝君王中名列第一。據《梁書·武帝本紀》云：

七年春正月乙酉朔，詔曰：建國君民，立教為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由，……宜大啟庠教，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sup>39</sup>

而《南史·儒林傳》亦云：

至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館有數百生，給其饘廩，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為吏，於是懷經負

祿同內百官，於是州及郡縣丞尉並悉同減。戊寅，罷國子學。」，頁 98。

<sup>36</sup> 《南齊書·高帝本紀》卷 1：「太祖以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姿表英異，龍穎鍾聲，鱗文遍體，儒士雷次宗立學於鷓山，太祖年十三，受業，治禮及左氏春秋。」，頁 3。

<sup>37</sup> 《南史·劉瓛傳》卷 50，頁 1236。

<sup>38</sup> 《南齊書·高帝本紀》卷 2，頁 37-38。

<sup>39</sup> 《梁書·武帝本紀》卷 2，頁 46。

笈者雲會矣。<sup>40</sup>

由於梁武帝的勵精圖治，提倡儒學，享國最久（48年），遂使南朝經學臻於前所未有之盛況，故《南史》作者李延壽評價云：「自江左以來，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sup>41</sup>影響所及，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致使北齊高帝高歡亦嘆曰：

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纒，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sup>42</sup>

由此可見，武帝「專事衣冠禮樂」，竟有如此效應，無怪乎北朝儒者如孫詳、蔣顯、崔靈恩、盧廣、宋懷方諸人，紛紛南來講學，且蒙武帝禮遇，並授以爵祿<sup>43</sup>。不過，惜其晚年耽於佛教，寵信佞倖，致遭侯景之亂，使得梁代國力一蹶不振。

陳代繼梁而起，正如《陳書·儒林列傳》所云：

高祖創業開基，承前代離亂，衣冠殄盡，寇賊未寧，既日不暇給，弗遑勸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今之採綴，蓋亦梁之遺儒云。<sup>44</sup>

面對遭侯景之亂過後的殘破江山，在位者而「日不暇給」而「弗遑勸課」，對學校亦缺乏積極作為，致教育成效有限。《陳書·儒林傳》中所列儒者，如王元規、周弘正等等，皆為「梁之遺儒」，足見陳代發展儒學的窘迫，南朝經學遂不復梁代之盛。

## （二）北朝方面

自拓跋氏統一北方，結束五胡十六國紛亂局面，對於幅員遼闊的北方，尤迫切倚重儒者為其政權運籌帷幄，規撫禮制，以便於治理。於是自北魏道武帝以降，北魏、西魏、東魏、北齊、北周諸朝歷代君主，大抵均能以氈裘之長，崇尚文教，推重經術，並在儒者幫助之下建立各項制度，使北人逐漸接受漢化。如《魏書·李先傳》云：

<sup>40</sup> 《南史·梁本紀》卷7，頁226。

<sup>41</sup> 《南史·儒林傳》卷71，頁1730。

<sup>42</sup> 《北齊書·杜弼傳》卷24，頁347-348。

<sup>43</sup> 《南史·儒林傳》卷71，頁1740。

<sup>44</sup> 《陳書·儒林傳》卷33，頁434。



太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文祕緯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太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sup>45</sup>

上文說明北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問李先，李先以「經書益人神智」及討論如何蒐集圖書之事，從中可見道武帝崇尚文教情事。除此之外，《北史·儒林傳序》亦云：

魏道武帝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道武帝）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達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聖、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林轉興。獻文天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孝文帝）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眾。（孝明帝）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

<sup>45</sup> 《魏書·李先傳》卷33，頁789。

未及簡置，仍復停寢。（孝明帝）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明帝）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永熙中，孝武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廐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東魏孝靜帝）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sup>46</sup>

上述《北史·儒林傳序》用較長的篇幅，娓娓道來拓跋氏統一北方以來，北魏歷代諸君立教設學，崇尚儒術的情形，其中包括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及東魏孝靜帝，除南安王（452-454）、孝莊帝（528-531）、節閔帝（531）、廢帝（531）4位北魏享國日淺的君主未見論述外，餘均可見其設立學校、崇尚經學的態度。如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博學眾經<sup>47</sup>；孝文帝元宏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甚至幸太學，親祠孔廟、詔求天下遺書，更為天下所樂道。<sup>48</sup>即使繼北魏之後，西魏、東魏、北齊、北周諸君，亦大多重視文教，傾慕儒學，如北周明帝宇文毓自幼好學，博覽群書；武帝宇文邕曾受《詩經》、《左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sup>49</sup>；而北朝帝王尊儒，較南朝尤甚，對於名儒如熊安生等，更待以殊禮，不惜以帝王之尊，親自拜訪。<sup>50</sup>對於大儒盧景裕涉入叛亂，北齊神武帝甚至因仰慕其學識而特加豁免。<sup>51</sup>由於君主對儒學的提倡，使得北朝經學頗能獲得良好的發展與推廣。

### （三）小結

所謂：「風俗之厚薄，繫乎一二人心之所向」，古今皆然，惟於君主專制的時代，影響更為深遠，故一家仁，可使一國興仁；一家讓，可使一國興讓。若以南北朝在位者對經學的態度論南北經學之盛衰，則南學誠有不如北學者。以南朝言之，宋齊梁陳各代君主，非全然無心於學術，其君主亦未必反對設立國子學，

<sup>46</sup> 《北史·儒林傳》卷81，頁2704-2705。

<sup>47</sup> 《魏書·太宗紀》卷3，頁49-64。

<sup>48</sup> 《魏書·孝文帝紀》卷7，頁135-187。

<sup>49</sup> 《周書·文閔明武宣諸子傳》卷13，頁201-210。

<sup>50</sup> 見《北史·儒林傳》卷81，〈序〉：「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頁2706。

<sup>51</sup> 如《北史·儒林傳》卷81，〈序〉：「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於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頁2705。

惟南朝各代君主似不如北朝君主於儒學堅定執著，所呈現者亦往往心未誠<sup>52</sup>、力未足<sup>53</sup>、勢未能<sup>54</sup>，以致學校置廢頻繁，使得教育功能不彰，成效亦寡。以宋武帝劉裕於永初3年（422年）下詔恢復國子學，卻直到文帝元嘉19年（442年），方建立國子學，距其就大位以來，延宕近20年之久，論其用心實難與北朝君王相比擬，宋文帝尚且如此，其他則更遑論矣。

除了學校置廢頻繁外，南朝的地方教育亦近乎廢弛，惟梁武帝對地方教育較為重視，除史載梁武帝曾「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外<sup>55</sup>，其餘宋、齊、陳三代狀況未見有所記載。整體而言，南朝經學之盛，惟在梁武帝一朝耳！反觀北朝除魏孝明帝孝昌元年（525）以降，迄孝武永熙2年（534），近10年間，因海內淆亂，四方學校所存無幾，呈現短暫衰敗景象外，餘均呈現君主對學術的提倡與愛好，故從在位者對經學的態度論南北經學之盛衰，恐北學其氣勢遠盛於南學。

### 三、從世變看南北經學盛衰

#### （一）南朝方面

穩定的世局有助於教育的發展與學術的弘揚，南朝自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420年）建國，至陳後主禎明3年（589年）為隋文帝所滅，前後共計169年。其間經歷宋齊梁陳四代。以宋代而言，其國祚為59年，其間有武帝、少帝、文帝、孝武帝、前廢帝、明帝、後廢帝、順帝共8主，平均每位帝王在位未滿8年<sup>56</sup>，以如此短暫的政權，欲成就教育百年大業，誠有不可能者。如武帝即位後第3年（422年）即下詔立國子學，然武帝竟於同年5月駕崩，致使政策無法實施，遲至元嘉19年（442年），方設立國子學。以齊代而言，其國祚為23年，其間有高帝、武帝、鬱林王、海陵、明帝、東昏侯、和帝共7主，平均每位帝王在位未滿4年<sup>57</sup>，高帝建元4年（482年）詔立國子博士，置五經博士各1人，惟是年即

<sup>52</sup> 如《南史·儒林傳·伏曼容》卷71，頁1731。其中云：「聚徒教授以自業。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為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由上述可見，明帝於儒術似不虔誠專一。

<sup>53</sup> 如宋武帝劉裕雖於即位後第3年（422年）即下詔立國子學，然於同年即病逝。

<sup>54</sup> 如南朝歷代君王大多享國日淺，政權不穩，遑論文教。

<sup>55</sup> 《南史·儒林傳》卷71，頁1730。

<sup>56</sup> 計7.38年。

<sup>57</sup> 計3.29年。

駕崩；武帝享國較久（11年），故能於永明3年（485年）立有國學外，其後南齊諸君，恐欲求其帝位之鞏固而未能，更遑論崇教化、立學校等工作。以梁代而言，其國祚為55年，其間有武帝、簡文帝、豫章王、元帝、貞陽侯、敬帝共6主，除梁武帝在位48年，為南朝在位最久之君外，梁代其餘諸君在位幾未滿3年，無怪乎，南朝經學之盛，成效之著，幾惟在武帝一朝。梁以後，陳代國祚為32年，其間有武帝、文帝、廢帝、宣帝、後主共5主，平均每位帝王在位未滿7年<sup>58</sup>，政局變動頻繁，於經學誠難有較大的成就，其儒生亦多為前朝遺老。

南朝169年之間，除各代國祚淺短，君王在位不長，造成政局不穩定外，內亂外患頻仍，亦有礙學術的發展。如宋文帝於元嘉19年，方建立國子學，復於元嘉27年（450年）即因宋魏的戰爭，不僅減百官俸祿，更廢國子學。<sup>59</sup>以宋代言之，其與北魏戰事頻仍，至南齊南北雙方亦和戰不定。梁武帝晚年更因侯景之亂，致南京殘破不堪。陳代繼梁而起，正如《陳書·儒林列傳》所云：「高祖創業開基，承前代離亂，衣冠殄盡，寇賊未寧，既日不暇給，弗遑勸課。」

由上述可見，因國祚短淺，致政局欠缺穩定性，以及因內亂外患之頻仍，所造成學校教育成效的不彰，誠為南朝經學發展上的兩大侷限。

## （二）北朝方面

自永嘉之亂，五胡雖以武力入侵中原，然目睹中原文物之盛，漸漸醉心華夏文明，如匈奴劉淵、劉聰、劉曜，羯族的石勒，鮮卑的慕容皝，氐族的苻堅，羌族的姚興等等均能崇尚儒學，廣設學校。因此，雖史書雖名之為「五胡亂華」，然實際上，「華」未必真為「胡」所亂。北方諸胡，雖文化素養不如漢人，然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因此，世亂並未對北方傳統文化造成較大的破壞，相反地，其漢化程度亦日漬日深。尤其自北魏拓跋珪於登國元年（386年）建國，至隋文帝開皇9年（589年）滅陳，結束南北對峙局面，北朝前後共計203年，其中北魏一朝即佔148年之久。相對於南朝前後169年，其間復經歷宋齊梁陳四代，北魏可謂呈現大一統的局面。其中道武帝在位23年、明元帝在位15年、太武帝在位29年、文成帝在位11年、孝文帝在位29年、宣武帝在位16年、孝明帝在位12年，以上7位君主在位均達10年以上，合計有135年之久，與南朝歷代諸君率皆享國日淺，動輒改朝換代，實不可以道里計，其政權穩定性遠較南朝為佳。

<sup>58</sup> 計6.40年。

<sup>59</sup> 《宋書·本紀第五》卷5：「以軍興減百官俸三分之一。三月乙丑，淮南太守諸葛闡求減俸祿同內百官，於是州及郡縣丞尉並悉同減。戊寅，罷國子學。」，頁98。

兼以北朝君主多能崇尚儒學，如宋文帝 27 年（450 年）冬 11 月，魏太武帝於宋魏之戰時，打敗宋將王玄謨，進至魯郡，以太牢祠孔子<sup>60</sup>，其在與南朝征戰之際，尚不忘享祀孔子，其尊孔崇儒如此。是故從世變看南北經學盛衰，似乎北朝經學所呈顯者，乃方興未艾的面目，南朝經學則頗受政局變動與內亂外患的影響，其盛衰消長可見。

### （三）小結

穩定的世局確有助於教育的發展與學術的弘揚，南朝歷代諸君除梁武帝在位最久外，其餘大多皆享國日淺，其政權穩定性遠不如北朝。因此，表現於官學方面，除梁武帝一朝較具成效外，其他時期大致均不如北朝，惟經由世變看南北經學盛衰，所反映者，主要在官學的成效，對於一時期經學之考察，吾人仍宜從其他角度來分析，如私學方面，著作情況等等，此一部分容下文論述之。

## 四、從經學教育興廢看南北經學盛衰

### （一）官學教育

#### 1、國子學

南朝各代由於國祚短淺，政局穩定性不足，復因內亂外患，造成學校教育或置或廢，成效不彰。其於經學教育獲致成效者，惟梁武帝而已，其詳已如前文所述。反觀北魏道武帝初定中原，便以經術為先，設立五經博士，及博士生千餘人，<sup>61</sup>此舉大致訂定了北魏國子學的基本架構，而北魏歷代君主亦在此一基礎繼續發展努力，「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sup>62</sup>，尤其在宣武之世更是達到巔峰，據《魏書·儒林傳》所云：

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眾。<sup>63</sup>

由於宣武之世距北魏道武帝立太學以來，已百有餘年，政權穩定，其間君主如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孝文帝均尊儒重道，崇尚文教，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sup>60</sup>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 37（臺北：夏學社景乾隆 33 年武英殿本），頁 1512-1513。

<sup>61</sup> 《魏書·儒林傳》卷 84，頁 1841。

<sup>62</sup> 同上註，頁 1842。

<sup>63</sup> 同註 61，頁 1842。



無怪乎迄宣武之世，人才培育斐然有成。孝武帝之後（534年），北魏分裂為東西魏，高歡和宇文泰分掌東魏與西魏之的實質政權，兩人同樣推廣經學，高歡遷都鄴城，「國子置生三十六人」<sup>64</sup>，且納大儒於賓館，以經術教授子弟。<sup>65</sup>其後北齊踵繼東魏，亦承襲不變，可見其君王尊儒重道如此。然而北齊學風猶不及西魏與北周，西魏宇文泰雅好經術，北周君主如周武帝更是重道尊儒，如《北史·儒林傳》云：

乃下詔尊太傅燕公為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酌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輜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魏、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sup>66</sup>

從上文中可想見周武帝敬重學術，禮敬儒者，無怪乎北周武帝一朝，文教發展達到巔峰。惟整體而言，北朝仍以北魏經學教育最盛，次則北周，再次為北齊。北魏得君主支持，國祚又長，教育成效得以延續；北周國祚不如北魏，然君主推廣，上行下效，又遍求名儒，故得居次；北齊雖有高歡好儒，然後繼者略不能承續其業，雖設國學及地方官學，亦不過聊備一格而已。

## 2、州郡學

南朝即如國子學，尚且時置時廢，地方官學教育更遑論矣。唯梁武帝尚能重視地方教育，《梁書·儒林傳》載武帝曾「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sup>67</sup>，雖然史冊記載亦不多，但相對於宋、齊、陳三代的狀況，則已屬不易。

北魏、北齊與北周皆有設立地方學校的政策，北魏獻文帝拓跋弘於天安初（約466年）便設立地方學校，依行政區域大小分配員額，如《魏書·高允傳》曾載云：

<sup>64</sup> 《魏書·儒林傳》卷84，頁1842。

<sup>65</sup> 《北齊書·儒林傳》卷44，云：「魏天平（東魏孝靜帝）中，范陽盧景裕……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同軌之亡，復徵中山張雕、渤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北齊文宣帝）、大寧（北齊孝昭帝）、武平（北齊後主）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頁528。

<sup>66</sup> 《北史·儒林傳》卷81，頁2706-2707。

<sup>67</sup> 《南史·儒林傳》卷71，頁1730。



允表曰：「……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世履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sup>68</sup>

北魏的地方教育，自獻文帝下詔郡國立學以來，多數能具體施行，即使在戰亂之後，地方官亦不乏積極從事恢復地方教育者，如《魏書·崔孝暉傳》即載其：

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民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篤，百姓賴之。<sup>69</sup>

由上述諸論，可知北魏政權於地方教育上之用心與成效，是以「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眾」，州郡之學尚能受到重視。至於北魏之後，北齊承襲前代舊業，亦能設立郡學，如《北史·儒林傳》云：

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遊惰，亦不檢治，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sup>70</sup>

倘《北史·儒林傳》所言屬實，北齊之時，地方官學不廢。不過，由於後繼君主不甚重視，亦連帶使得北齊士流豪族亦不甚支持，因而地方教育無法有效推展，僅聊備一格而已。

## （二）私學教育

### 1、南朝方面

南朝各代國子學時置時廢，地方州郡教育除梁武帝尚能措意於立學之事外，其餘宋、齊、陳三代近乎廢弛。對於經典的傳承，官學反不如私學能發揮相當的

<sup>68</sup> 《魏書·高允傳》卷 48，頁 1078。

<sup>69</sup> 《魏書·崔孝暉傳》卷 57，頁 1270。

<sup>70</sup> 《北齊書·儒林傳》卷 44，頁 583。

力量。如劉宋時，雷次宗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sup>71</sup>臧榮緒隱居京口教授。<sup>72</sup>吳苞長於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明帝泰始中（約468年），過江聚徒教學，與劉瓛俱在褚彥回宅中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夕聽苞。<sup>73</sup>蕭齊時沈麟士隱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sup>74</sup>劉瓛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sup>75</sup>徐伯珍其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受業生凡千餘人。<sup>76</sup>伏曼容善《老》、《易》，其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為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sup>77</sup>何佟之於齊東昏侯永元末年（約500年），京師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sup>78</sup>顧歡從邵玄受業，年二十餘，更從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於剡天臺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sup>79</sup>，明僧紹明經有儒術，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sup>80</sup>蕭梁之時，諸葛瓌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sup>81</sup>虞僧誕精杜學，該通義例，當世莫及，以《左氏》教授，聽者常數百人。<sup>82</sup>孔僉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生徒數百人。<sup>83</sup>許懋旦領師說，晚而覆講，座下聽者常數十百人。<sup>84</sup>皇侃少好學，師事賀瑒，尤明《三禮》、《孝經》、《論語》，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sup>85</sup>太史叔明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世冠絕，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sup>86</sup>伏挺為大儒伏曼容之孫，宅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sup>87</sup>至陳代之時，孫瑒博涉經

<sup>71</sup> 《宋書·隱逸傳》卷93，頁2292-2294。

<sup>72</sup> 《南史·隱逸傳》卷75，頁1887-1888。

<sup>73</sup> 同上註，卷76，頁1888。

<sup>74</sup> 同上註，卷76，頁1891。

<sup>75</sup> 《南史·劉瓛傳》卷50，頁1235。

<sup>76</sup> 同註72，卷76，頁1889-1890。

<sup>77</sup> 《梁書·儒林傳》卷48，頁662-663。

<sup>78</sup> 同上註，卷48，頁663-664。

<sup>79</sup> 同註72，卷75，頁1874。

<sup>80</sup> 《南齊書·高逸傳》卷54，頁927。

<sup>81</sup> 同註72，卷76，頁1901-1902。

<sup>82</sup> 同註77，卷48，頁677。

<sup>83</sup> 同上註。

<sup>84</sup> 《梁書·許懋傳》卷40，頁575。

<sup>85</sup> 同註77，卷48，頁680。

<sup>86</sup> 同註77，卷48，頁679。

<sup>87</sup> 《梁書·文學傳》卷50，頁720。

史，尤便書翰，常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為學者所稱。<sup>88</sup>張譏性恬靜，不求榮通，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及若干沙門、道士皆傳其業。<sup>89</sup>王元規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元規後為南平王府參軍，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sup>90</sup>由上述可見，南朝各代國子學與地方官學，雖或成效不彰，惟民間私人講學風氣盛行，故能傳承經學，培育人才，維繫南朝文化之繁榮景象於不墜。

## 2、北朝方面

北朝各代無論中央或地方學校教育，大體均能受到一定的重視，至於民間講學，亦不乏其人。據南北朝諸史冊所載，如北魏張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sup>91</sup>梁祚篤志好學，歷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sup>92</sup>劉曷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sup>93</sup>郭瑀為劉曷之師，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sup>94</sup>馮元興師事張吾貴、房虬，通《禮》、《傳》<sup>95</sup>，年二十三，還鄉教授，常數百人。<sup>96</sup>東魏張雕開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數，諸儒服其強辨。<sup>97</sup>北齊時，馮偉少從李寶鼎遊學，尤明《禮》、《傳》，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耕而飯，蠶而衣，門徒束脩，一毫不受。<sup>98</sup>李鉉師事李周仁、劉子猛、房虬、鮮于靈馥、徐遵明，為徐遵明高第，後教授鄉里，生徒恒至數百。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sup>99</sup>；張買奴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sup>100</sup>鮑季詳於《禮》甚明，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為李寶鼎都講，後亦自有徒眾，諸儒稱之。<sup>101</sup>馬

<sup>88</sup> 《南史·孫瑒傳》卷 67，頁 1638-1639。

<sup>89</sup> 《南史·儒林傳》卷 71，頁 1751。

<sup>90</sup> 同上註，卷 71，頁 1756。

<sup>91</sup> 《魏書·儒林傳》卷 84，頁 1844。

<sup>92</sup> 同上註。

<sup>93</sup> 《魏書·劉曷傳》卷 52，頁 1160。

<sup>94</sup> 同上註。

<sup>95</sup> 按：魏晉南北朝史書中，其單言「傳」者，似指《春秋左氏傳》，如《魏書·儒林傳》於張吾貴本傳云：「（吾貴）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卷 84，頁 1849-1851。

<sup>96</sup> 《魏書·馮元興傳》卷 79，頁 1760。

<sup>97</sup> 《北齊書·張雕傳》卷 44，頁 594。

<sup>98</sup> 《北齊書·馮偉傳》卷 44，頁 587-588。

<sup>99</sup> 《北齊書·李鉉傳》卷 44，頁 584-585。

<sup>100</sup> 《北齊書·張買奴傳》卷 44，頁 588。

<sup>101</sup> 《北齊書·鮑季詳傳》卷 44，頁 588。

敬德少好儒術，負笈隨大儒徐遵明學《詩》、《禮》，其解《春秋左氏》為諸儒所稱，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眾。<sup>102</sup>熊安生歷事陳達、房虬、徐遵明、李寶鼎，通《五經》，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sup>103</sup>北周時，房暉遠世傳儒學，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恆以教授為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sup>104</sup>杜臺卿好學博覽，及周武平齊，歸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sup>105</sup>由上述可略見，北朝民間講學梗概，透過官學與私學雙軌教育的推展，北方雖經五胡亂華，中原士族向南播遷種種情狀，惟在經典教育上，尚能維持一定的素養。

### （三）小結

南北朝經學教育的差異，就官學言，南朝國子學時置時廢，地方州郡官學亦幾近廢弛。反觀北朝無論國子學與地方官學，向為歷代君王之所重，因此，大抵均能持續性地推動。若從官學系統言，整體言，南朝實不如北朝之盛。

論及私學教育的發展，南北朝在私學上均能有名儒碩士，於民間從事講學工作，而且均有不少生徒。不過，由於南朝向為魚米之鄉，經濟條件遠較北方優渥，文化底蘊深厚，濟濟多士薈萃。因此，在官學的推動上，誠然南不如北，然論及私學，無論從講學諸儒及生徒人數來看，南朝均不遜於北朝，論其底蘊深厚，亦遠非北朝可及，此可從後文南北朝經學典籍的多寡，亦能反映一二。因此，若欲就經學教育興廢，衡量南北經學盛衰，恐宜分從官學與私學兩方面一併看待，方稱平允。

## 五、從學術風氣純駁看南北經學盛衰

古今以來學者論北朝經學盛於南朝者，每每以學術純駁為判準，如皮錫瑞《經學歷史》云：「北學反勝於南者，由於北人俗尚樸純，未染清言之風，浮華之習，故能專宗鄭、服，不為偽孔、王、杜所惑，此北學所以純正勝南也。」〔清〕焦循亦謂：「正始以後，人尚清談。迄晉南渡，經學盛於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齊，遂不能為儒林立傳。梁武帝天監中，漸尚儒風，於是《梁書》有〈儒林傳〉，《陳書》嗣之，仍梁所遺也。魏儒學最隆，歷北齊、周、隋，以至唐

<sup>102</sup> 《北齊書·馬敬德傳》卷 44，頁 590。

<sup>103</sup> 《北史·熊安生傳》卷 82，頁 2744。

<sup>104</sup> 《北史·房暉遠傳》卷 82，頁 2760。

<sup>105</sup> 《北史·杜臺卿傳》卷 55，頁 1990-1991。

武德貞觀，流風不絕，故《魏書·儒林傳》為盛。<sup>106</sup>文中可見，焦循亦從「尚清談」或「尚儒風」論南北經學之盛衰。

李延壽《北史·儒林傳》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人深蕪，窮其枝葉」，雖然李氏之言，論者多謂其偏袒南學，並加以批評<sup>107</sup>，然從中亦反映北學較南學樸實的面貌，而南朝多儒道兼習，亦為不爭之論。如《南史·儒林傳》云：

伏曼容少篤學，善《老》、《易》。

嚴植之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

太史叔明少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禮記》，尤精三玄。

除《南史》外，《梁書·武帝本紀》亦載：「梁武帝少而篤學，洞達儒玄」<sup>108</sup>，以南朝經學之盛的梁皇，尚且「洞達儒玄」，亦可類推南朝學術風貌。而北朝諸儒，若據《北史·儒林傳》及《北齊書》、《北周書》、《魏書》、所錄諸儒，其兼涉經學與玄學者，較諸南朝，確實不多見。又如《魏書·李業興傳》亦載魏末大儒李業興於出使梁朝時，武帝曾詢及玄學問題，李業興答云：「少為書生，止習五典，……素不玄學」。<sup>109</sup>由此可見，北學樸實，不雜玄談之風。

惟經學不雜老莊玄談之言，或可比較南北學的「純駁」，然是否可藉以論斷南北經學的「盛衰」，恐猶待商榷！蓋此中涉及「經學」當以何面目呈現的問題？若以拘守兩漢家法，偏重章句訓詁、或雜染讖緯、象數為主的鄭、服經學，方謂之「純正」，方可目之為「經學」，則無疑當以北朝為盛。惟既謂之「盛」，便不應北消南長，造成部分北學逐漸為南學所取而代之；惟倘視經學本應與時俱進，既能復古，兼能啟新，不拘守家法，能兼容並蓄，而與時代思潮融合者，則南學之「駁雜」，何嘗不可視為經學之盛。況南朝義疏之學，綜括漢魏注經方式，間亦融入玄學、佛學因子，使經說呈現多元與創新的風貌，由是影響唐代《五經正義》與宋代理學的萌芽，於經學史的發展，固有其不可抹滅的歷史地位，則南朝的經學，從另一角度論之，毋寧亦為「經學」之盛。否則，唐宋以降，三教合一

<sup>106</sup> [清]焦循：《雕菰集·國史儒林文苑傳議》卷12（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頁181。

<sup>107</sup> 如上文皮錫瑞之說。

<sup>108</sup> 《梁書·武帝本紀》卷3，頁96。

<sup>109</sup> 《魏書·儒林傳》卷84，頁1863。



融合日深，經學更形駁雜，是否亦當視為經學之衰？因此，以經學的純駁，來論斷經學的盛衰，誠有值得再商榷者。

## 六、從經學著作多寡看南北經學盛衰

身軀非金石，誰能長不朽？早在《左傳》中即以「立言」為不朽之業<sup>110</sup>，曹丕《典論·論文》亦謂：「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因此，著書立說，自古以來每為吾國知識份子視為首要的任務，即使命運乖舛，鬱結不通，莫不發憤述作，欲成風雨名山之業，以留諸後人。

### （一）南朝方面

從南北朝經學家及其經學著作觀之，南朝雖政權更替頻仍、兵馬倥傯，致國子學時置時廢，然民間私學，絃歌不輟；北朝雖在異族統治之下，然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其仰慕中原文化，不亞於漢人，於是南北二地，中華文化均得以綿延不絕，其間著作數量，亦頗為可觀。

據《隋書·經籍志》記載，魏晉鄭默、荀勗總括群書，四部圖書大凡有 29945 卷，惟經懷愍亡國，京華蕩覆，秘閣藏書，靡有子遺。東晉初年漸次鳩集，經李充校理，但有 3014 卷。宋元嘉 8 年謝靈運《四部目錄》著錄有 64582 卷。元徽元年，王儉《目錄》著錄有 15704 卷。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謝朓等《四部書目》著錄有 18010 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初，祕書監任昉著錄文德殿等藏書，有 23160 卷，經梁武帝大興文教，至元帝時，圖書已達七萬餘卷，惜於周師入郢時，竟自焚圖書。陳初，雖重加鳩集，惟遺闕尚多。不過，從南朝雖屢經戰火兵燹，圖書散而復聚，短時間便能蒐羅至萬卷以上，苟非人文底蘊深厚，讀書藏書者眾，必難以致此。

### （二）北朝方面

五胡十六國時，北朝文教之盛，苻、姚而已。東晉安帝義熙 13 年（417 年）劉裕入關殲滅姚泓，從長安收其彝器、珍寶、圖籍，其中五經子史，才四千卷，可見其圖書之短缺。<sup>111</sup>迨至魏道武帝初定中原，曾問李先「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sup>112</sup>由此觀之，北朝經籍數量，頗為稀少，致道武帝萌生

<sup>110</sup> 《左傳·襄公 24 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景嘉慶 20 年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頁 609。

<sup>111</sup> 《隋書·牛弘傳》卷 49，頁 1299。

<sup>112</sup> 《魏書·李先傳》卷 33，頁 789。



蒐集圖書之念。迄魏孝文帝徙都洛邑後，因推行漢化之需要，更感於圖書不足，曾借書於南齊<sup>113</sup>，於是祕府之中稍見充實。後遭尔朱榮之亂，復散落人間。北齊遷鄴，頗見搜聚。至北周保定之始（561年），圖書亦止八千，後稍有增加，方至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惟所加舊本，僅五千卷耳。<sup>114</sup>由此可見，北朝君主雖頗提倡儒教，但圖書始終短缺不足，亦為不爭之事實。

### （三）南北朝經學著作的比較

經學典籍的多寡，每能反映經學傳習的概況。由上述南北朝四部圖書著錄來比較，顯然是北不及南。若再進一步論及經學著作，以《隋書·經籍志》言雖列有經學相關著作，如《易》類有 69 部，551 卷；《書》類有 32 部，247 卷；《詩》類有 39 部，442 卷；《禮》類有 136 部，1622 卷；《春秋》類有 97 部，983 卷。惟上述書目尚包括南北朝以前著作，其中亦多所闕漏，今試以國立編譯館主編《十三經論著目錄》為底本，<sup>115</sup>並參酌周何等編《十三經著述考》<sup>116</sup>、王鏞《三禮研究論著目錄》<sup>117</sup>、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先秦一代）》<sup>118</sup>，鳩集統計，並試區分南北朝，以茲比較如下：

- 《周易》南朝 44 北朝 11 不詳 51，共計 106 種
- 《尚書》南朝 16 北朝 3 不詳 0，共計 19 種
- 《詩經》南朝 32 北朝 8 不詳 1，共計 41 種
- 《三禮》南朝 108 北朝 26 不詳 18，共計 152 種
- 《春秋》南朝 84 北朝 22 不詳 18，共計 124 種

由於時代湮邈，南北朝著作絕大多數亡佚不存，即上述表列所彙集南北朝經籍，恐亦屬冰山一角，不可能呈現南北朝經學著作全貌，然亦可藉此略窺一代經籍的繁富。尤其南朝雖政權更替頻仍，然南方人文薈萃，文化底蘊深厚，加以晉室南遷，中原士族亦大多隨之南渡，南方儼然為正朔所在，六朝京華，風流蘊藉，即使南朝書籍屢遭兵燹，卻能於短時間內迅速鈔寫鳩集。再從北朝曾求書於南朝，南朝則未嘗求書於北朝，即可略見一斑。從南北朝經學著作數量上觀之，五經著

<sup>113</sup> 《南齊書·王融傳》卷 47，頁 818-820。

<sup>114</sup> 《隋書·經籍志》卷 32，頁 906-908。

<sup>115</sup> 國立編譯館主編：《十三經論著目錄》（臺北：洪葉文化，2000 年）。

<sup>116</sup> 周何等編：《十三經著述考》（臺北：國立編譯館，2003 年）。

<sup>117</sup> 王鏞：《三禮研究論著目錄》（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 年）。

<sup>118</sup> 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先秦—元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作中，無論何經，南朝經籍數量均遠勝於北朝。因此，純就經學著作來看南北朝經學盛衰，固當以南朝為盛矣。

## 七、結語

本文從五個方面探討南朝與北朝經學盛衰的比較，希望能從多元角度來分析前賢以「盛衰」一辭論述南北朝經學的妥切性。經上述研究結果，所得結論如下：

其一：

南朝各代君主似不如北朝君主於儒學的堅定執著，以致學校置廢不一，使得教育功能不彰，成效亦寡。反觀北朝君主大多重視文教，傾慕儒學，使得北朝經學頗能獲得良好的發展與推廣，若從在位者對經學的態度論南北經學的盛衰，則南朝誠有不如北朝者。

其二：

南朝 169 年之間，各代國祚淺短，君王在位不長，造成政局不穩定，內亂外患頻仍，誠有礙於學術的發展。反觀北朝前後共計 203 年，自拓跋珪建國，北魏一朝即佔 148 年之久。相對於南朝，可謂呈現大一統的局面。若從世變及政權穩定性，及其所影響之官學系統來看南北經學盛衰，則南朝亦誠有不如北朝者。

其三：

南朝國子學時置時廢，地方州郡官學幾近廢弛。反觀北朝無論國子學與地方官學，大抵均能持續性地推動。若從官學系統言，南朝實不如北朝。論及私學教育發展，南朝雖不若北朝能獲得在上位者大力提倡，然而從名儒及生徒人數來看，南朝竟能不遜於北朝，若非經濟富裕，人文底蘊深厚，何以能臻於此！是以若欲就經學教育（含官學與私學）的興廢，衡量南北經學盛衰，則官學方面誠南不如北，然就私學言之，則表面上看來，南北雖各有千秋，難分軒輊，然未獲上層持續有力奧援的南朝，其所反映之文化底蘊，誠非北朝可以比擬者。

其四：

玄風對南北經學的影響，或可比較其「純駁」，然是否可藉以論斷南北經學的「盛衰」，恐猶待商榷！蓋此中涉及「經學」當以何面目呈現的問題？若如皮錫瑞以「純正」角度論經學盛衰，則無疑當以北朝為勝；惟倘以「創新」角度視之，則不拘守家法，能兼容並蓄，並融合時代思潮之南學，何嘗不可視為經學之盛。因此，單以經學純駁論經學盛衰，誠有值得商榷者。

其五：

著書立說，向為吾國知識分子之所重，固未嘗以乖舛鬱結而弗務，南北朝經學著作豐富，惟從南北朝經學著作數量上觀之，五經著作中，無論何經，南朝經籍數量均遠勝於北朝。因此，純就經學著作來看南北朝經學盛衰，固當以南朝為盛矣。

透過上述研究，前賢遽以「盛衰」一辭，比較南北朝經學短長，恐怕難以真正反映南北經學的全貌。唯有從多元的角度，並鳩合舊籍，借助史料，再作進一步的歸納分析，方能還原南北朝經學實際情形，並瞭解諸家對南北朝經學理解的差異。

因此，筆者研究所得結論如下：北朝歷代君主在敬重學術，禮敬儒者，推展文教方面，令人感動與崇敬。惟經學之盛衰，前賢習於從官學系統著眼，而疏於從民間私學系統觀察，恐有失於片面。況南朝風流，人文薈萃，文化積澱之深，原非北朝氈裘之長所能望其項背。因此，儘管南朝政權如何變動，在位者如何無心無力，然由於中央與地方政府尚不至於棄絕文化，民間亦未因政權不穩，遂中輟往聖絕學的傳承。相反地，經典教育依然在鄉里絃歌不絕。是以南北朝經學在彼此消長融合之際，南學雖未能盡併北學，卻呈凌駕之勢，無怪乎！〔唐〕孔穎達纂修《五經正義》時，雖南北學兼採，然在某種程度上，確也呈現重南輕北傾向，此已無關個人好惡，而是大環境使然。 【責任編校：廖婉茹】

## 附錄 北朝私學一覽表

朝代	姓名	問學授業內容	備註
宋	徐璠之	於祛蒙山立精舍講授。	《南史·隱逸傳》卷76，頁1889-1890。
	周續之	詣(范)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武帝)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後復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講學。	《南史·隱逸傳》卷75，頁1865-1866。
	何尚之	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慕道來遊者眾，謂之南學。	《宋書·何尚之傳》卷66，頁1732-1739。
	雷次宗	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劉宋時，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又徵詣都，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	《宋書·隱逸傳》卷93，頁2292-2294。
	臧榮緒	純篤好學，惇愛《五經》，隱居京口教授。	《南史·隱逸傳》卷75，頁1887-1888。
	吳苞	長於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泰始中，過江聚徒教學，與劉瓛俱在褚彥回宅中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夕聽苞。齊時立館鍾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門焉。	《南史·隱逸傳》卷76，頁1888。
齊	沈麟士	無所營，以篤學為務。蕭齊時，隱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	《南史·隱逸傳》卷76，頁1891-1892。
	何胤	有儒術，懷隱遁之志，建武初，築室郊外，號曰小山，恒與學徒遊處其內。	《南齊書·高逸傳》卷54，頁938。
	劉瓛	博通《五經》。宋時，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齊時，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為大儒。	《南史·劉瓛傳》卷50，頁1235-1238。

	徐伯珍	其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受業生凡千餘人。	《南史·隱逸傳》卷76，頁1889-1890。
	伏曼容	善《老》、《易》。聚徒教授以自業。齊時，其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為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	《梁書·儒林傳》卷48，頁662-663。
	何佟之	少好《三禮》，師心獨學，手不輟卷，讀禮、論三百篇，略皆上口。齊永元末年，京師兵亂，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	《梁書·何佟之傳》卷48，頁663-664。
	顧歡	從邵玄受業，年二十餘，更從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於剡天臺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	《南史·隱逸傳》卷75，頁1874。
	明僧紹	明經有儒術，宋永光中，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	《南齊書·高逸傳》卷54，頁927。
梁	諸葛璩	蕭梁之時，諸葛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	《南史·隱逸傳》卷76，頁1901-1902。
	虞僧誕	精杜學，該通義例，當世莫及，以《左氏》教授，聽者常數百人。	《梁書·儒林傳》卷48，頁677。
	孔僉	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生徒數百人。	《梁書·儒林傳》卷48，頁677。
	許懋	十四入太學，且領師說，晚而覆講，座下聽者常數十百人。	《梁書·許懋傳》卷40，頁575。
	皇侃	少好學，師事賀瑒，尤明《三禮》、《孝經》、《論語》，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	《梁書·儒林傳》卷48，頁680。
	太史叔明	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世冠絕，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	《梁書·儒林傳》卷48，頁679。

	伏挺	為大儒伏曼容之孫，天監年間，宅居 <u>潮溝</u> ，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	《梁書·文學傳》卷50，頁720。
陳	孫瑒	博涉經史，尤便書翰，常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為學者所稱。	《南史·孫瑒傳》卷67，頁1638-1639。
	張譏	性恬靜，不求榮通，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休、至真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	《南史·儒林傳》卷71，頁1751。
	王元規	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元規後為南平王府參軍，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	《南史·儒林傳》卷71，頁1756。
北魏	張偉	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	《魏書·儒林傳》卷84，頁1844。
	梁祚	篤志好學，歷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	《魏書·儒林傳》卷84，頁1844-1845。
	常爽	篤志好學，博聞強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置館 <u>溫水</u> 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	《魏書·儒林傳》卷84，頁1848-1849。
	劉獻之	曾受業於勃海程玄，後遂博觀眾籍。獻之論學，要以德行為首，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	《魏書·儒林傳》卷84，頁1849-1850。
	張吾貴	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吾貴覽讀一遍，便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與劉獻齊名，海內皆曰儒宗。每一講唱，門徒千數，惟其行業可稱者寡。	《魏書·儒林傳》卷84，頁1849-1851。



劉蘭	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解說不本儒之旨，惟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為精悉。又明陰陽，博物多識，為儒者所宗。其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眾。	《魏書·儒林傳》卷84，頁1851-1852。
徐遵明	歷師王聰、張吾貴、孫買德，每不終業。遂居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六年。後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為北朝儒宗。	《魏書·儒林傳》卷84，頁1855-1856。
董徵	師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就高望崇受《周官》，後從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	《魏書·儒林傳》卷84，頁1857。
刁冲	學通諸經，偏修鄭說，陰陽、圖緯、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精博。雖屢受徵召，不好之。惟以講學為心，四方學徒從學者，歲有數百。	《魏書·儒林傳》卷84，頁1857-1859。
李曾	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為業。	《魏書·李孝伯傳》卷53，頁1167。
劉曷	敦煌人。就博士郭瑀學。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	《魏書·劉曷傳》卷52，頁1160。
郭瑀	郭瑀為劉曷之師，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	《魏書·劉曷傳》卷52，頁1160。
高允	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在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	《魏書·高允傳》卷48，頁1067。
馮元興	師事張吾貴、房虬，通《禮》《傳》，年二十三，還鄉教授，常數百人。	《魏書·馮元興傳》卷79，頁1760。

東魏	張雕	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開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數，諸儒服其強辨。	《北齊書·儒林傳》卷44，頁594。
北齊	馮偉	馮偉少從李寶鼎遊學，尤明《禮》《傳》。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門徒束脩，一毫不受，自耕而飯，蠶而衣，簞食瓢飲，不改其樂。	《北齊書·儒林傳》卷44，頁587-588。
	李鉉	師事李周仁、劉子猛、房虬、鮮于靈馥、徐遵明，為遵明之高第。復教授鄉里，生徒恒至數百。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	《北齊書·儒林傳》卷44，頁584-585。
	張買奴	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名聲甚盛。	《北齊書·儒林傳》卷44，頁588。
	鮑季詳	甚明《禮》，兼通《左氏》，少時恒為李寶鼎都講，後亦自有徒眾，諸儒稱之。	《北齊書·儒林傳》卷44，頁588。
	鮑長暄	為鮑季詳從弟。兼通《禮》《傳》，武平末，恒在京教授貴遊子弟。齊亡後，歸鄉里講經。	《北齊書·儒林傳》卷44，頁588。
	馬敬德	少好儒術，負笈隨徐遵明學《詩》、《禮》，其解《春秋左氏》為諸儒所稱。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眾。	《北齊書·儒林傳》卷44，頁590。
	熊安生	歷師陳達、房虬、徐遵明、李寶鼎，通《五經》，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	《北史·儒林傳》卷82，頁2743-2744。
北周	房暉遠	世傳儒學，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	《北史·儒林傳》卷82，頁2760。
	杜臺卿	杜臺卿好學博覽，及周武平齊，歸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	《北史·杜臺卿傳》卷55，頁1990-1991。

附記：本表所附諸史，蓋以臺北：鼎文書局標點本二十四史為依據。

## 主要參考文獻書目

## 專書

- 《左傳》：臺北：藝文印書館景嘉慶 20 年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臺北：夏學社景乾隆 33 年武英殿本。
- 令狐德棻等：《周書》，臺北：鼎文書局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二十四史。
- 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臺北：廣文書局，2001 年。
- 田漢雲：《六朝經學與玄學》，南京：南京出版社，2003 年。
- 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漢京文化，1983 年。
- 李百藥：《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二十四史。
- 李延壽：《北史》，臺北：鼎文書局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二十四史。
- 李延壽：《南史》，臺北：鼎文書局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二十四史。
- 李威熊：《中國經學發展史論（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 年。
- 沈約：《宋書》，臺北：鼎文書局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二十四史。
- 汪惠敏：《南北朝經學初探》，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6 年。
- 林登順：《魏晉南北朝儒學流變之省察》，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 年。
- 姚察等：《梁書》，臺北：鼎文書局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二十四史。
- 姚察等：《陳書》，臺北：鼎文書局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二十四史。
- 陳金木：《皇侃之經學》，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 年。
- 陳金木：《劉焯劉炫之經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9 年。
- 章權才：《魏晉南北朝隋唐經學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年。
- 焦桂美：《南北朝經學史》，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06 年。
- 焦循：《雕菰集·國史儒林文苑傳議》，臺北：鼎文書局，1977 年。
- 葉國良：《經學通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 年。
- 劉光育：《南北朝儒學研究》，南京：南京大學中國哲學專業博士論文，2004 年。
- 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臺北：京華書局，1970 年。
- 劉詠梅：《皇侃《論語義疏》研究》，曲阜：曲阜師範大學歷史學專門史碩士論文，2006 年。
- 蕭子顯：《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二十四史。
- 簡博賢：《今存南北朝經學遺籍考》，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5 年。
- 魏收：《魏書》，臺北：鼎文書局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二十四史。

顧濤：《皇侃《論語義疏》研究》，南京：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4年。

**期刊論文**

陳鴻森：〈北朝經學的二三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6本第4分，1995年12月，頁1075-1101。

陳鴻森：〈魏晉南北朝經學史小識〉，《東海學報》第35卷（一）文學院，1994年7月，頁1-20。

黃忠天：〈南北朝經學之消長與統一〉，《孔孟月刊》第30卷第8期，1992年4月，頁20-28

黃麗娟：〈魏晉南北朝經學中衰原因探析〉，《思辨集》第3集，1999年3月，頁75-92

戴榮冠：〈南北經學交流與南朝義疏發展之探究〉，《高師大國文學報》2，2005年6月，頁223-248

### 審查意見摘要

#### 第一位審查人：

- 一、歷來論南北朝經學者，往往先有分立的觀點，再來為分立所造成的異同找證據，以致各家皆有其說法，莫衷一是。本文借助各種載籍、史料，重新省查、評駁前人說法的得失，以解決經學史上的一大問題，用意至佳。從舊籍中耙梳零星史料，貫穿成文，以明事實真相，可謂用心良苦。
- 二、本文從君主在位態度、時局勢變、經學教育、經學純駁、經學著作等五個方面來評判南北朝經學的異同，方法已較前賢進步許多，所得結論自較合理。如能從學風的繼承關係，來看兩者間的異同，更能增加本文的證據力。

#### 第二位審查人：

有鑑於經學史家，對於南北朝經學的定位，有認為南學盛而北學衰者，有認為北學盛而南學衰者，評價不一致，作者遂從：（一）在位者的態度，（二）世變，（三）經學教育，（四）學術風氣，（五）經學著作之多寡，共五個面向，比較南北朝之短長。結論認為：（一）、（二）兩項北勝於南，（三）則官學系統北勝南、私學南勝北，（四）則「純正」北勝南、「創新」南勝北，（五）則南朝遠勝於北朝。作者認為：儘管北朝在位者推崇經學，政局穩定，普設官學，但南朝人文薈萃，私學興盛，著述眾多，因此之故，唐修《五經正義》，雖兼採南北學，然在某種程度上則有重南輕北之傾向。

本文之貢獻，乃在作者不以單一標準作論斷，而能從各種面向之分析，指出唐代經學的淵源，從而使學界對南北朝經學有更正確之評價。若論瑕疵，則南朝私學盛於北之說，本文所列資料並不足以支持。

